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主办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社会文化史 的理论与实践

梁景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文化史 的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梁景和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97 - 1372 - 3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282 号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主 编 / 梁景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曹艳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75

字 数 / 46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72 - 3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 (代序)

梁景和

一 西方新文化史述略^①

(一) 称谓与崛起

西方新文化史是史学界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的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运动,或曰它是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取代了经济—社会史,是对旧的体制和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是继 20 世纪 50 年代中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股热流 70 年代初传入意大利、英国,80 ~ 90 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

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愿意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 1997 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还愿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愿意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者卡布瑞更愿意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

^① 本节主要参照的文献有〔英〕彼得·伯克著《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第 4 期;江文君《西方新文化史简析》,《国外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 年第 6 期;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 1 期;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 年第 1 期等。



（二）代表人物与传承

新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 1963 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了“向文化的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60 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把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海登·怀特于 1973 年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由于怀特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所以他被视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新文化史这股潮流，还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理查德·普莱斯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学批评家也都卷入新文化史运动之中。

在学术传承上，新文化史受 60 年代兴起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理论的影响颇深，但同时对前者的批判也是促进新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如 1983 年剑桥大学教授加瑞斯·斯蒂德曼·琼斯出版的论文集《阶级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研究 1832~1982》，书中对汤普森进行了批评，另外，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的专著《人民的视界：工业的英国和阶级问题 1848~1914》也对汤普森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

（三）性质与特征

关于新文化史的性质，林恩·亨特对此做过说明，它“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做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

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①。

新文化史研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注重文化，注重文化的作用，甚至倒转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改变过去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认为文化可以决定政治和经济，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阈研究历史，强调文化的独立，认为“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和生产着社会和经济。这就是说，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②。第二，在方法上采取跨学科研究，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第三，从研究范围和内容看，从“宏大叙事”中转向，更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第四，新文化史的著作更注重雅俗共赏。所谓“雅”是指遵守专业的规范，无论是资料选择和考证、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学术观点论证都显得十分严谨和专业化。所谓“俗”是指关注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大众文化，关注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下里巴人”；所谓“俗”还指新文化史的著作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语言流畅，可读性强，能够引起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新文化史的未来发展将是对传统社会史的扬弃和融合，其实质是向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逐渐回归和发展。

（四）理论和方法的四个来源

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这四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的历史编撰和叙事风格。

海登·怀特 1973 年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学。怀特借鉴了西方学者六七十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将之运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并认为语言模式决定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式。他强调历史的文本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历史可以通过形象思维去想象、

①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利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 198 页。

② 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 年第 1 期，第 31 页。



去发明。历史的资料来源是广泛的，口述、文学、民间故事都是历史研究的资料。要摆脱宏大叙事，回归历史学的叙事传统，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实质是对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一个认同和融合。所以，新文化史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和基础的。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文化人类学逐渐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新盟友。克利福德·吉尔茨1973年的著作《文化的解释》，提出了对文化的定义，即“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①。他的文化定义影响很大，新文化史学家们自觉地以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注重探索历史事物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而理解民族和个体的观念特征和性格特征，并要求一种“深度描述”的研究方法，即要关注日常生活，要关注生活细节，要强调微观史研究。由此可见，文化人类学是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来源之一，主动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也就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文化史影响至深。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虽然人们常常把汤普森划归为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历史学家的行列，但他的这本书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的常见方法，诸如计量的方法等，而是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构成，把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善于运用价值、观念、习俗、传统等文化术语。汤普森甚至强调：“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② 汤普森的表述让人们感受到他充分肯定了文化的因素，强调文化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汤普森也常常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对文化的格外关注，引起了史学界的警觉，同时打开了史学家的视阈，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法国年鉴派史学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化史。法国第三、四代年鉴学派

① 转引自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55页。

② 转引自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52页。

开创了“心态史”，这标明了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雅克·勒高夫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说：“‘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① 心态史的创始人主张恢复年鉴学派第一代注重精神状态研究的传统，把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了社会文化方面，认为心态是史学研究的深层结构。心态史的影响很大，它既是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同时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以上四个方面都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中心地位，进而构成了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四个重要源泉。1989年林恩·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出版，这是对新文化史兴起以来所作的理论总结，正式高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形成。

（五）基本研究类别与代表作

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彼得·伯特曾将新文化史分为七大类别：（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② 周兵把新文化史分为四个类型：（1）物质文化史；（2）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3）身体和性的文化史；（4）实践与表象的文化史。^③

新文化史涉及的内容的确丰富多彩，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

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广泛繁盛，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除上文谈到过的，还有一些代表作，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

① [法] 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31页。

② [英] 彼得·伯克著《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第25~26页。

③ 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第37页。



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 1975 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 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

此外，还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诸如《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巴黎 1900：历史文化散论》，《鳕鱼》，《盐：生命的食量》，《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欧洲饮食文化史：从石器时代至今的营养史》，《欧洲宴会史》，《内衣：一部文化史》，《六个瓶子里的历史》，《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 3500 年》，《服饰的时尚 800 年：1200~2000 年》，《世界鞋史》，《钻石的历史》，《文身的历史》，《书籍的历史》，《镜子的历史》，《煤的历史》，《人类与垃圾的历史》，《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瘟疫的故事》，《疾病改变历史》，《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迷药》，《可卡因传奇》，《男根文化史》，《乳房的历史》，《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想》，《亚当之脐：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城市》，《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疼痛的历史》，《厕神：厕所的文明史》，《欧洲洗浴文化史》，《沐浴的历史》，《色情史》，《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游戏》，《西方情爱史》，《欧洲风华史》，《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阅读史》，《流浪的历史》，《接吻的历史》，《刑罚的历史》，《死亡文化史》，《魔鬼的历史》，《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廉耻观的历史》，《恐怖：起源和演变》，《搞笑：幽默文化史》，等等。^①

（六）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

新文化史是在以往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它与某些史学有着紧密的

^① 参见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一文的注释部分，《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 1 期。

联系，下面我们分别阐述之。

1. 与后现代史学的关系

目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著作还颇为鲜见，但一般把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视为带有后现代史学意味的著作，也把它看做是最直接影响新文化史产生的一部著作，因此海登·怀特也被称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尔斯密特称娜塔莉·戴维斯和卡洛·金斯伯格为“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但他们的著述又被看做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可见，后现代史学与新文化史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是相通的，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的。

2. 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不仅是新文化史的理论来源之一，同时也是新文化史借鉴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是强有力的。新文化史的很多著作借鉴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两者之间盟友般的互动，使双方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接纳文化人类学，并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史学家去用新的方法了解更多的未知领域。娜塔莉·戴维斯作为美国新文化史的开拓者之一，她在其《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也大量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3. 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前文我们已经谈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正因为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更强调文化的因素，注重对文化的探索，所以他被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文化主义”，甚至有人还通常把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看做是西方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4. 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

可以说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的心态史学直接带来了新文化史的兴起。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是从以往关注系列、功能和结构向关注观念、心态、价值、情感、思想和文化的方向变化，这种转变被视为“从地窖转向阁楼”^①。所以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不但在理论方法上为新文化史做好了准备，而且也可视其为新文化史兴起的第一阶段。^②

① [英] 彼得·伯克：《法国的历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第67页。

② 参照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



5. 与古典文化史的关系

古典文化史（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在关注文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新文化史也带有向古典文化史方向的回转，但两者还有明显的不同。古典文化史注重的是功能和结构，注重宏大叙事，注重时代肖像，注重精英，注重思想、文学艺术、精神和习俗等的研究；而新文化史则更注重日常生活，注重微观研究，注重下层民众，注重史学与读者的联系，注重跨学科研究。

（七）余论

1. 反叛与问题

任何一种新的史学撰写和叙事方法，任何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它们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和重大的突破，进而推动史学的向前发展。但同时任何一种新的史学撰写和叙事方法，任何一种新的史学范式，也都必然存在它自身的不足和问题。这也是史学能够不断跃进和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因由或内在驱动力。新文化史亦不例外。

新文化史的确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是对以往史学的反叛，特别“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①。这种反叛无疑推动了史学的长足进步，当前新文化史的这种反叛精神仍然保存着它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它自身的问题也将在其兴盛和发展的过程中渐次显露。诸如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而淡化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这样是否就能真正地解释历史的一切；比如脱离和躲避宏大叙事而着力于微观史学的关照，这样是否同时也忽视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历史观察；再如特别地关注日常生活而削弱对其他社会生活的注意力，是否就同时远离了社会历史的诸多面相，而只能形成片面的历史观念；还有历史是否就只是一种意义的解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难道不能作科学的研究，不能探索其客观性和其运动的规律吗，如此等等，这就暴露了新文化史的诸多问题。

2. 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最直接把新文化史介绍到中国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彼得·伯克是最早参与和领导新文化史运动的历史学家，1999年9月他应邀到华东

^① [英] 彼得·伯克著《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第27页。

师范大学讲学，他到中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学术演讲，着重介绍新文化史。他不仅第一次将“新文化史”的概念名称介绍到中国，而且全面介绍了新文化史的诸多情况。在中国期间彼得·伯克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采访，其形成的《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发表在200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上。他撰写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上。这些文章不但进一步传播了新文化史，而且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目前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研究西方新文化史，而且在具体的学术领域也开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探索。

二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大陆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文化史研究，80年代中期再次兴起社会史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举起社会史与文化史共生共荣的旗号，并开始探讨和使用社会文化史这一概念。二十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本文仅以中国大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例进行阐述。

（一）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问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她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①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②。1990年李长莉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③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梁景和于1991年开始在学术领域运用“社会文化史”^④的概念，并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探讨的是“社会文化史

①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③ 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④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①。

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②,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和贵阳召开了三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③,也有探讨社会文化史理论的文章^④。2009年6月和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⑤,这也是首次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近二十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⑥,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在此仅重点介绍11部书。一是刘志琴主编的,分别由李长莉、闵杰、罗检秋撰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840~19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二是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09);三是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四是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五是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六是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七是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八是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九是王笛的

①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②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诸如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⑤ 参见《中国女性文化》总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⑥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请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安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2期等文的介绍,本文不再专门介绍。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十是梁景和主编的《社会生活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十一是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①另外，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中华书局版），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可专门论述，此略。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是用社会文化一词命名的专著，三卷本150万字。本书在编撰体例上有其特殊性，是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梳理，以时间为经，以社会文化为纬，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习尚、大众文化、社会思潮等进行了系统地描述，进而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作了铺叙，此书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研究婚姻、家庭、妇女、性伦文化演化的一本专著。本书在对以往主要文化概念进行梳理之后，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对文化、人伦文化、文化精华、文化糟粕、陋俗文化、性伦文化等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近代陋俗文化的演变历程。本书提出了“人类精神进化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陋俗文化的演变结合起来，认为“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演变并非特定期内孤立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它既是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主旨，又是再次实现人的自身觉悟和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②。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对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作了多面的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征。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对20世纪百年间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及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变迁作了通观性的记述。本书“以史识图，以图证史，将书斋中的学识，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作了淋漓尽致

①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王燕生等译；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此不赘述。

② 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67页。



的发挥,从服饰潮流、饮食文化、居住条件、交通设施、婚姻礼俗、两性观念、慈幼养老、丧祭制度、岁时节日、娱乐活动、社会保障、社会风尚等十多个方面,有形有色地描绘出20世纪一百年中国社会生活演变的全景图像,并揭示这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深远意义”^①。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视角,即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②,对生活方式的演变进行考察的。本书对“生活方式”的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提出“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设计了“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装饰、休闲方式、文化生活”这种反映内在逻辑关系的框架结构。本书主要探索了社会生态、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三个中心概念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这样的探究在国内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多见,或者说还没有像本书这样自觉,所以本书是一次学术前沿的探究,是向学术处女地的开拓。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是运用城市学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末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这是对中国近代民众生活与社会心态所作的开拓性研究。本书既注重上海人的社会心态,又注重上海人的社会行为;既注重上海社会精英的心态,又注重上海芸芸众生的精神。本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上海人心态变化的过程和表现作了多角度与多层面的研究与阐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繁复的晚清上海人心态变迁的历史画卷。

《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以往人们所忽视的人口、人格、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活及消费、收入、物价、建筑、语言、民俗、衣食住行以及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去分析其内在的互动关系,进而对1927~1937年10年间的上海社会的演变作了全面的勾勒和论述,揭示了上海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征及其内在规律。作者自称这是“全息社会生活史”。

《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一书也定位于“生活与思想之间”这一视角,对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作了具体而又全面的考察。全书纵横研究相结合。纵向研究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揭示其变化的从“扬”到“洋”再到“新”的过程。横向研究则论述了社会风尚在沿海与内地的地域差异,以及

①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序言》,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

②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在官吏群体、知识群体、商人群体、市民群体和农民群体之间的群体差异。此书被论者视为“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考察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并论述了风尚变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①。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从“街头”这个新颖的角度，对近代成都城市公共空间与民众生活作了考察，“‘街头’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城市文化史可供讨论的内容和课题极大地得到了拓展”^②，本书对城市史研究作出了新的原创性和开拓性贡献。本书立意新颖，语言生动形象，可读性强，“使读者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③，体现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

《社会生活探索》一书是用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当代以来的婚姻、家庭、妇女、性伦文化等社会文化问题的演变的。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妇女、性伦等问题，实际是历史学、文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本书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共同问题的多学科对话，可以引发诸多的学术思考并可得到若干启示。

《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一书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用意。本书以民国城市婚姻生活为主题，以恋爱、结婚、离婚、纳妾四位一体为基本架构，以女性的视角为切入点，以当时流行的具有时代新内涵和多层次性的婚姻观念为侧重点进行了学术研究。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通过对观念与社会实际互动关系的分析，揭示民国时期女性婚姻的一些具体而又复杂的问题，所以是一部典型的社会文化史专著。

（二）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见解，请参见有关会议纪要和综述。^④ 下面仅

①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② 马敏：《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③ 王笛：《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就几篇理论探索的论文作简要介绍。

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开篇就强调“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申明了开拓社会文化史的学术意义，同时指出“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了大众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探讨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必将成为跨世纪的热点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旺”。^① 刘文重点谈了四个问题。其一，传统史学的饥饿，导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刘文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征伐边务无所不包谈起，指出中国史学虽然成熟但不完备，中国史学因缺乏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受等重要内容，而使中国史学形成了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饥饿”现象。要解决中国史学的“历史饥饿”，就要重写中国历史，那么贴近民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史学的进步，是史学走向深化的表现。其二，改革开放是引发史学发展的一条新线索。从文化史到社会史再到社会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多条线索中之一条，这条线索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着。80年代初，学术界随着改革的呼唤，从文化反思发端，渐次出现文化研究的热潮，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当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形成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立自己的学术系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开辟出新的天地。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潜力的阵地。其三，世俗生活的理性化。以礼化俗即为礼俗，礼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精英文化的价值观渗进世俗生活，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生活伦理意识是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稳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是社会变革中最难触动而又必须触动的层次。从世俗理性剖析历

^① 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